善良的珍妮

老椰子 译

【说明】

大约是八一年的暑假，我看到学校油印的一本英文小册子，供理科学生英语阅读用的。暑假中，我一边读一边把它草译在笔记本上。这是一个平实而感人的故事，写的是一位英国姑娘在二次大战中在马来亚的遭遇。我不知道同期校友中有谁读过然后还记得这本小册子，也不知道原书叫什么名、作者是谁、有否中译本。我索性送给它一个名字“善良的珍妮”。

现在，英文原文已经找不到了。我只是把原来的草译略做文字上的修饰敲出来送给大家。不敢说是翻译而又不是编译，就算是一本“读书笔记”吧！

（一）珍妮的早期生活

珍妮．佩吉一九二一年生在马来亚。当时，马来亚是英国的殖民地，有许多英国人住在那里。这些英国人有的是殖民地政府的工作人员，有的在军队、警察机构、学校、医院等公益部门工作，但绝大多数人从事工商业。马来亚的最主要的工业是开采锡矿和种植橡胶。

珍妮的爸爸是一个大橡胶园的管事。这个橡胶园位于彭亨州，在首都吉隆坡北面大约一百英里处。

佩吉先生和他的妻子儿女就住在橡胶园里。他有一儿一女，男孩子叫唐纳；女孩子就是珍妮，比哥哥小三岁。

在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照顾他们的保姆是个马来女人，她跟孩子们讲马来语，所以孩子既能讲英语，也会讲马来语。

起初，佩吉太太自己教孩子念书。在唐纳十三岁、珍妮十岁时，他们被送回英国上学，住在祖父家里。祖父家在骚桑普敦附近。骚桑普敦是距离伦敦八十英里左右的一座大城市。

两年之后，祖父生病了。佩吉太太只好也回到英国，在骚桑普敦买了一所小房子，和儿女们住在那里照顾他们上学。

在珍妮十三岁的时候，她爸爸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佩吉先生在吉隆坡办完公事，天已很晚了。在回住所的路上，他可能因疲倦瞌睡而驾车撞到了路边的树。

佩吉先生去世了。佩吉太太还算是没有后顾之忧：公司付给她一笔抚恤金，并答应在唐纳中学毕业后给他安排一个工作。

珍妮和唐纳都是很平常的孩子，不属于极其聪明的那种。但是他们在学校里非常用功，也很守本份。他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本事，就是会讲马来语。作为一种别人听不懂的秘密的家庭语言，起初，马来语只是被他们用来讲讲笑话什么的。

后来，他们变成了有目的地讲马来语。因为，唐纳有意步爸爸的后尘回橡胶园去工作，那么，具有马来语的能力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他就在家里就经常练习，做妹妹的珍妮则陪他练。

唐纳在一九三七年回到马来亚，这时的珍妮刚好十六岁。次年，珍妮中学毕业，进了骚桑普敦的一所商业学校。她学习了六个月的速记和打字，然后在一个机关从事速记和打字工作一年。在这一年中，妈妈为她去马来亚做好了准备。

在了解到唐纳所在的橡胶园公司驻吉隆坡办事处需要一个办事员后，佩吉太太就写信给公司经理，表示珍妮可以象她哥哥一样努力为公司工作。

公司对哥哥唐纳的工作表现非常满意，同时对珍妮的马来语能力感兴趣，他们回信同意雇用珍妮。

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突然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没有使珍妮改变计划。事实上，她觉得去马来亚可能反倒安全一些，因为战火是在欧洲燃烧。

幸好，战争的开始只有小规模的战斗，珍妮乘船离开英国去马来亚的途中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珍妮到达马来亚。

珍妮喜爱她在马来亚的生活方式。她住在吉隆坡，住在一个英国女人开设的一家小而幽静的旅店里的一个房间里。旅店里住的都是英国人，而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办公室上班的英国姑娘。

珍妮的办公室位于市中心。她喜欢她的工作也结交了许多朋友。她上午认真工作，下午去打网球，晚上到社交场所去跳舞，生活中充满了欢乐。

珍妮的将来看来应该是稳定和按步就班的。有朝一日她要嫁人，嫁给一个自己喜欢的在锡矿或橡胶园工作的男人，象她的妈妈那样在马来亚住下来。她将来的生活应该是幸福的。

马来亚的居住环境和英国相似，而这里的天气又是四季如春、阳光充足。还有，会有许多仆人帮着她照料家务．．．珍妮应该就是一个这样的幸运的姑娘。

然而，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一九四一年，日本在战争中站到了德国一边。

送交者: 老椰子 于 June 23, 2002 02:11:34:

（二）珍妮离开吉隆坡

日本人侵占了满州并进攻中国和印度支那。他们计划先征服这些国家，然后入侵马来亚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更远的国家。

在马来亚的英国人不相信日本人有战胜这许多国家的能力。在吉隆坡，英国人的日子过得一如既往，人们照常工作、社交。有些男青年自愿加入部队，每周接受两、三次军训。可是，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唯一不同是，这些小青年儿在穿着新军装出入社交场合时所具有的不同往日的自豪。

不久以后，日本人在东北角的海岸入侵马来亚，逼近距吉隆坡三百英里的哥达巴鲁市。但是，由于在日本军队和吉隆坡之间有深山密林的阻隔，吉隆坡的人们仍然没有什么紧迫感。

两艘战列舰从英国被派来作战，但不久就被日本飞机击沉。这时，吉隆坡政府要求妇女儿童撤到南方二百英里处的新加坡，但只有很少的人这么做。珍妮，还有绝大多数的人仍然在逗留。他们不相信自己正处于危险中。

日本人向南快速推进。他们用飞机把士兵们运过高山，士兵们一着陆，就搜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各种大小汽车，甚至自行车。

直到这个时候，吉隆坡的英国人才意识到他们的危险处境。一天早上，珍妮的领班麦里曼先生把珍妮叫到他的办公室。

“珍妮，”他说，“我有个坏消息告诉你。日本鬼子已经到了怡保，离这儿只有一百英里了，一点也不能浪费时间，我们今天就关闭办事处，你要尽快赶去火车站，乘头班车去新加坡。”

“新加坡？”珍妮惊讶地问。“可是我到那里去干什么呢？我到那里去哪儿呢？”

“去我们在新加坡的办事处，”麦里曼先生回答。“那里的人会照顾你的，他们会给你弄个舱位让你回英国去。”

“这里确实危险吗？”珍妮问。

“确实危险。”麦里曼先生回答。“我已经通知所有其他姑娘了，你会在车站见到她们，和她们一起离开。”

珍妮离开了办公室，直接去银行取出了她的全部存款六百美元。然后她回到旅馆，把东西收拾在一个手提箱里，便离开旅馆向火车站走去。

忽然，她想起了城北二十英里处的朋友。她相信他们肯定没有离开。她相信他们的撤离需要她的帮助。于是，她没有去赶火车，而改乘汽车去了北面的本通。

珍妮的朋友是比尔．浩兰和艾伦．浩兰。比尔是一家锡矿的管事，他和妻子艾伦还有三个孩住在锡矿旁边的一座漂亮的平房里。他们有两个男孩儿，佛罗第和罗宾；女孩儿名叫简妮。佛罗第是老大，七岁。简妮四岁。罗宾是个刚满十个月的婴儿。

珍妮在近午到达本通。艾伦．浩兰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家。家中里里外外乱七八糟。地面上放着许多手提箱和旅行袋，衣服遍地都是。佛罗第在院子里玩儿，衣服上、脚上满是泥浆。简妮倒在地上哭叫着揉膝盖。小娃娃在大声哭，一定正饿着。艾伦正准备做午饭，又要忙着照顾他们。看到珍妮，艾伦喜出望外。

“珍妮，亲爱的，真高兴见到你。”艾伦嚷道。“你看我这里，忙死了，乱死了，孩子又都饿着呢！”

“你准备午饭吧，”珍妮答应着。“我来照顾孩子。”

珍妮立刻投入工作。她给简妮的膝盖贴了一小块药膏，又给佛罗第洗了脚换了干净衣服。过一会儿，午饭好了，大家坐下来吃饭。

“嗳，你家比尔到哪里去了？”珍妮问艾伦。

“他在吉隆坡。”艾伦回答。“一早他出去给我们的破汽车买新胎去了。我们很长时间没用这车了，发动机还转，可有两个胎要漏了。”

“公司那些小汽车、大卡车呢？”珍妮问。“为啥不从中拿一个用？”

“都没啦！”艾伦说，“几个礼拜前都让军队征用了。这台破车是他们给留下的唯一一台。”

“比尔什么时候走的？”珍妮问。

“一大早，”艾伦回答，“已经八个小时了，我正担心着呢。”

“他不会出事的，”珍妮说，“一会儿他就会回来。”

“和你在一起我真高兴！”艾伦问道，“你能留下来帮我们忙吗？”

“那当然”珍妮回答。

比尔．浩兰回来的时候天都快黑了。他又饿又渴，可是一见到珍妮他非常高兴。他坐了下来，喝了好一阵子凉水。

“这最后的五英里我是用步行的。”他告诉她们。“公共汽车不肯往这边开了。走得真是又热又累。”

“你弄到轮胎了吗？”艾伦问他。

“没有，艾伦。”他回答说。“我没有弄到。军队把吉隆坡的每个轮胎都弄走了，我连一个也找不到。”

“那我们怎么办？”艾伦问。

“明早八点有从吉隆坡去新加坡的公共汽车。”比尔回答说。“车上大家都能有座位，那就好多了。顺利的话，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到新加坡。”

“可是我们怎么去吉隆坡呢？”艾伦问。

“就用这台车。”比尔回答说。“我们还是得用这旧轮胎。路呢，只有二十英里，我们小心、慢慢地开，就能安全到达。”

“为什么我们不今夜就走？”珍妮问。

“这倒是个好注意！”艾伦赞同。“夜里凉快。孩子们可以在车上睡觉。”

“夜里不能走。”比尔解释道，“这样不安全。军队不让任何人在晚上使用公路。他们在所有的桥头和十字路口都布了哨，看见有人就会开枪。”

“情况真是越来越糟糕了！”珍妮说。“那我们明天一定要早早出发。现在就把所有的行装搞好，省得明早麻烦。”

“那我们什么时候起床？”艾伦问。

“四点左右吧。”比尔说。“这样，我们就有时间给孩子们穿好衣服，吃早饭，然后装车，锁上房门及时离开。”

“好，”珍妮说。“那我们现在就包装吧！”

当他们上床睡觉的时候，都快半夜了。珍妮非常疲劳，可是她一点儿也睡不实。夜半十分，她听到比尔起床到外面去了。她透过蚊帐看到他正站在那里注视着森林。她起身通过门廊向他走过去。

“出了什么事？”她问道。

“我觉得好象听到了什么声音。”比尔回答说。

“在房子附近吗？”珍妮压低声音说。

“不是，我觉得好象听到了老远的地方有枪声，”他说。“可是现在却什么也听不见了。”

他们继续站在那里听，但是只有青蛙和昆虫的鸣叫。

“天快亮吧！”比尔说。

他们回去睡觉了。就在这天夜里，日军击溃了英军到达了斯利姆河边，离珍妮他们已不足五十英里了！

（三）吉隆坡、皮纳之行

比尔、艾伦和珍妮在黎明前两个小时就起了床。他们把行李集中了一下装上了车。然后，他们做好了早饭，叫醒了孩子们。天还没亮，他们就上路了。

装着三个大人、三个孩子还有许多行李，汽车严重超载。比尔小心翼翼地开车，以免出现爆胎。可是，刚刚开出二英里，轮胎就爆了一个。

这下他们只好使用备胎，也是个旧的。大家从车上下来看着比尔换轮胎。没多久，十几分钟后，他们又继续赶路了。

比尔的车开得更加小心了，但这无济于事，走了半英里，备胎也爆了。比尔决定就用这破了胎的轮子行驶。这样做会严重地损坏汽车，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就这样又走了二英里多，车轮子彻底损坏，汽车再也不能动了。

离吉隆坡还有十五英里。当时的时间已是七点，再有一小时公共汽车就要发车。他们显然已是无法赶上公共汽车了，除非能立刻弄到一辆汽车。

离公路不远有一些某个橡胶园的房子。艾伦和珍妮守着汽车和孩子，比尔跑过去看看是否可得到些协助。他先是想找个管事的人，可那里连个人影也没有。后来，他试图找到个小汽车、卡车什么的，可这些东西早被军队给弄光了。他慢慢地向他的汽车走来，两手空空，无可奈何。

他回来后，看到孩子们在哭叫，每个人都处于极度的干渴和燥热之中。

“我什么也没找到。”他说。“我们干脆步行吧！”

“我们还是回我们的平房去吧，”艾伦说。“那里凉快多了，我们会好受些。这热可真是折磨死人了，又连口水都喝不上。”

“可是，我们回去也要走五英里呀！”比尔说。“让我们向吉隆坡走吧，也许路上会遇到个卡车呢！”

“可是，也许我们遇不到什么卡车。”艾伦说。“那怎么办？我们哪能走得了十五英里的路呢？”

“你的意见呢，珍妮？”比尔问道。

“我们不能留在这里，”珍妮说。“我相信我们也走不到吉隆坡。我想，我同意艾伦说的，我们应该回到平房去。”

于是，他们决定回去。他们把行李留在车里，然后锁上所有的车门，一人抱一个孩子，开始向回走。

中午时分，他们回到了平房，又累又渴。喝了一些冷饮之后，他们就一个个地都倒在床上了。

一小时之后，一辆卡车开来停在外面。珍妮醒了过来，跑到外面想看看是什么人。一个青年军官跳下车快步向她走来。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他发问。“你们必须随我的卡车马上离开！你们一共有几个人？”

“六个，”珍妮回答说。“三个大人，三个孩子。”

“可是我们的行李怎么办呢？”艾伦问道，她已和比尔一起出来了。

“是啊，”比尔说。“我们的全部行李都在抛锚的汽车上，而汽车在去吉隆坡的路上，离这里大约五英里。你能先到那儿帮我们把行李取来吗？”

“不，绝对不能。”军官坚决地说。“日本鬼子离这里就只有二十英里了。我准备把诸位同胞送到皮纳去。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在那里找条船到新加坡去。”

于是，浩兰一家和珍妮就上了卡车的后厢。军官开着卡车绕行在锡矿的橡胶园之间寻找英国人。下午正中，卡车的后厢里面装载着大约四十个男人、女人和儿童到达了皮纳。这些人当中，有的根本就不知道危险的来临，还没有打算逃离；而另外一些人，诸如浩兰夫妇，则是试图逃离但行动得太晚了。

军官把卡车一直开到镇长的办公室旁，下车走进办公室。过了几分钟，镇长走出办公室。他看了看站在卡车上的人们，面带忧色。

“把卡车开到帐房那里去吧。”镇长对军官说。“这些客人可以在过廊里呆上一两个小时。告诉他们不要走得太远。”

“你能弄到一艘汽艇吗？”军官问他。

“弄不到。”镇长回答。

“那你用什么方法把他们运走？”军官接着问。

“我不知道。”镇长回答说。“我希望能用渔船把他们运到海滨，有几艘汽艇正停在海滨那里。”

军官把卡车开到帐房，大家都下了车。人们高兴极了，因为他们又能重新走动和在廊阴下躲避烈日了。

艾伦背靠着墙坐了下来，孩子们在她身边玩耍。比尔和珍妮到商店去了。他们的东西全放在汽车上了，身边什么都没有。

他们还有能力买些食品和药物。他们寻找蚊帐，但没有找到。珍妮给自己买了点儿针线。她又注意到一个大帆布背袋，就把它买了下来。她当时哪里知道，这个大背袋她背了几乎整整三年！

也就一杯茶的工夫，他们回到过廊下，告诉艾伦他们都买了些什么。喝了点儿柠檬水，吃了些小点心，他们坐在过廊静等。

与此同时，镇长在为他们找船。傍晚时分，他接到一个从灯塔打来的电话，带来一个好消息：大型汽艇“欧斯普雷”出现在江面。

镇长不明白为什么“欧斯普雷”会在这时出现。无论如何，那是个又大又快的船，可以把他的客人一次运到海滨。他决定在汽艇一到达他就去找艇长谈一谈。于是，他离开了办公室向码头走去。

一会儿，“欧斯普雷”在河湾出现了。镇长看到甲板上有许多军人，灰绿色军装，五短身材。他们是日本人！

镇长心头为之一震：原来是日本人劫获了“欧斯普雷”，而他们随后就要俘获他的客人。镇长帮不上他的客人了。

（四）俘虏

日本兵快速上岸。他们立刻逮捕了镇长并用枪把他押回办公室。

日本兵试图在皮纳找到英军，但此处确实一个军人也没有，仅有的一个开卡车的军官已经开车离开去别处找人了。

日本兵不久来到了帐房，发现并包围了这些英国人家庭。士兵们命令女人们摘下她们的戒指和手表，然后塞起来匆匆跑掉。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一个日本军官带着两个士兵来到帐房。士兵们把俘虏们一字排开并端着步枪对着他们。孩子们吓得哭了起来。俘虏们谁也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这名军官一言不发地盯了他们几分钟，然后用蹩脚的英语向他们讲话。

“你们，现在俘虏地干活。”他说。“你们，服从我，服从我的士兵。不服从，统统死啦死啦地！”

谁也没有说话。

“今晚，住在这里。”他说。“明天，去俘虏营地。”

“我们能有床和蚊帐吗？”一个男人问。

“日本兵床地没有，蚊帐地没有。”他回答说。“俘虏、士兵统统一样地，床地没有，蚊帐地没有。”

“能给点儿吃的吗？”另一个男人问。

“吃饭，明天地。”他回答说。“现在，睡觉地干活！”

军官留下士兵看守他们，自己走开了。

俘虏们睡在过廊的地板上。尽管他们都很累，可却一点儿也睡不好。地板太硬，蚊子又凶。孩子们因手臂腿脚的痛痒整夜地哭。大人们要起来哄孩子。而当他们重新躺下时，就会想到不知有什么灾祸要降临。人们心中烦恼、恐慌，哪里睡得安稳？

到了早上，所有的人都苦不堪言。没有几个人睡了完整的觉。大家的四肢全给蚊子咬肿，全身酸软疼痛。他们还感觉到脏兮兮的，可是没有洗漱用水。

没有人给送食物，他们只能用身边自带的东西充饥。浩兰一家还算幸运，因为珍妮和比尔在前一天买了一些食品。吃了一点儿东西后，他们感觉稍好受了一些。

上午过一半的时候，小野队长，就是那个日本军官，对他们全部进行提问。他依次和每个家庭谈话并用一个学生练习本作记录。问题都不长。这之后，小野队长向大家训话了。

“男人，今天去俘虏营地干活。”他说。“女人、孩子，留下。男人，午后开路。现在，赶紧告别地进行。”

听到小野队长这话，大家都难过起来。人们知道，在战时，男女是要分营的，但他们还是希望在一起，哪怕是多呆一小会儿。

在那些家庭依依惜别的时候，珍妮去试图搞蚊伤药。起初，她走到看押士兵那里，她先指了指她的蚊伤，然后指了指商店。可是，看押士兵却用步枪把她押回过廊。

后来，她饶到了帐房的后面。一群镇上的孩子在五十米左右的地方玩耍。她向他们挥手并用马来语轻声呼唤。

“姑娘，你，姑娘，”她叫道。“到这里来。”

一个大约十二岁左右的女孩子跑了过来。

“叫什么名啊？”珍妮问她。

“哈丽佳。”女孩子胆怯地回答。

“好，哈丽佳，你知道那个卖药的店铺吗？”珍妮和气地问。“就在那边，这镇子上的那家中国店。”

“我知道。”哈丽佳立刻接茬儿。“那是陈国方的店。”

“好，”珍妮说。“你去告诉陈国方，让他到我这里来。告诉他，白人俘虏有蚊伤了，要买点儿药。如果他能来，我就给你十分钱。”

孩子去了。不一会儿，中国店主拿着一篮子药膏来了。他走道岗哨那里，用手指了指俘虏。哨兵让他进了过廊。珍妮买了六瓶药膏，别的女人立刻把余下的很快买光了。哈丽佳得到了十分钱。

后来，日本兵提来了两桶稀鱼汤和半桶粗米饭。俘虏们没有碗，不能够平均分配食物，所以有人吃了许多，有人根本没吃到。好在他们手里还有些饼干之类的东西。饿着的人就吃些饼干垫一垫。

下午，小野队长带着几个士兵来了。他命令男人们立刻准备上路。男人们便去同自己的妻儿告别。比尔请珍妮帮助照顾艾伦和孩子们。随后，男人们便给让站成一排押走了。

这里还剩下三十二个俘虏。其中有十九个孩子，最大的十四，最小的还是怀中的婴儿。除了珍妮和另一个姑娘，所有的女人都是结了婚的。珍妮是唯一一个能讲马来语的人。她们要在帐房里度过四十一天。

那天晚上，她们又得到一桶鱼汤，免除了夜里的过分饥饿。而又由于已经允许她们进到帐房里面住，所以也略微舒适了一些。可是，还是没有蚊帐、毯子和床，大家还是睡不好。

第二天早上，一个名叫何塞福尔的女人提出要见队长。当小野队长赶到时，她气愤愤地冲着他嚷。

“小野队长，”她喊道。“我们再也不能这样睡觉了！我们应该有床。我们应该有毯子。我们应该有蚊帐。”

“床地没有，蚊帐地没有。”小野队长回答说。“日本女人，床地没有，蚊帐地没有。你们，日本女人，一样地。”

“可是，我们是英国人。”何塞福尔夫人愤怒地叫。“我们可不是动物，不能睡在地板上！”

小野队长狠狠地瞪着她，随后叫来两个士兵捉住她的两臂，挥手打了她四个耳光。

“八嘎！坏女人！”他厉声骂道，然后转身走了。

当小野队长在下一天的早上来查点时，何塞福尔夫人再次勇敢地向他提要求。这一次她提出要洗漱用水。他同意每天送些水。从此，她们可以洗漱了，但还是不能洗衣服。

起初，俘虏们手中还有一点儿钱，可以用来购买她们需要的东西。大多数的家庭每天让饭店给烧一次饭，因为她们都吃不惯那种鱼汤和米饭。她们还从商店买了一些肥皂和防治疟疾的奎宁。

她们慢慢地过她们的新生活。孩子们睡在地板上问题不算大，可老太婆就不行了。年纪大的女人经常在梦中被痛苦唤醒，根本睡不了多少觉。

第一个礼拜结束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染上了痢疾。孩子们整夜地叫着要上厕所。小野队长试图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他增加了米饭配给量并且在每天下午送一桶茶。

第三十五天，一个女孩子死了。她刚刚八岁。她染上了痢疾，身体越来越弱，哭的多，睡的少。后来就发了高烧，有两天高烧四十度。何塞福尔夫人跟小野队长说，这个女孩应该看医生。可是，皮纳没有医生。第二天早上，这个女孩子就死了，尸体当天烧化。

六个礼拜过去了。这天，在早查点后，小野队长向俘虏们训话了。她们的衣服又脏又破，许多人正在病中。

“女士们，”他说。“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皇军，攻占了新加坡地。马来亚，马来亚全国地，统统地，被皇军解放。女人、孩子的俘虏营，在新加坡地干活。你们，去新加坡，去新加坡地，幸福大大地。”

“我们怎么去新加坡？”何塞福尔夫人问。

“到吉隆坡，火车地坐。”小野队长说。

“那我们怎么去吉隆坡呢？”何塞福尔夫人问。“坐卡车吗？”

“对不起，卡车地没有。你们，你们走路地。”小野队长说。

“我们走不了那么远的路。”何塞福尔夫人说。“那有将近五十英里呢！要有一辆卡车才成。”

“卡车地没有。你们走路地！”小野队长又发火了。

“那我们的行李怎么办？”何塞福尔夫人问。

“行李，抗着地干活！”小野队长大声喊着离开了。

善良的珍妮(续)

（五）去吉隆坡的路上

黎明，一个士兵提来了一桶米饭和一桶茶。妇孺们吃罢早饭，开始做上路的准备。她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也没收拾好。九点钟，小野队长来了。看到她们还没有离开，他气坏了。

“现在，立刻开路地！”他吆喝着。“不然，我的士兵会打你们。今天，走到阿依平支。路地不远。走路，幸福大大地。不走，当兵的打你们。现在就开路。”

三十一名妇孺上路了。一个日军曹长带路，三个士兵跟在后面。艾伦．浩兰抱着小娃娃罗宾，背着珍妮的背袋。珍妮则背着又重又热的毯子，拉着四岁的简妮。

她们走的慢极了。为了等人，她们不得不每隔几分钟就停一次，因为押解的士兵决不让任何人走在他们的后面。就这样，她们每小时只能走一英里半左右。

逐渐地，她们的脚开始疼痛。可是，孩子们却没事，因为他们都没有穿鞋。而女人们由于穿着鞋，走的双脚又肿又热。过一段时间，珍妮觉得还不如象孩子们那样光着脚舒服一些，索性就把鞋扔掉了。路面有些烫脚，但走起路来确实容易多了。

她们在天快黑了的时候到达了阿依平支。村里有一栋用来装橡胶的长长的大房，现在正空着。村长就让她们住在那里。日本兵烧了些菜、米饭和鱼汤。可是，俘虏们多数一点儿也吃不下。

天还没有全黑，珍妮走到房子外面的士兵面前。她指了指村子里的店铺。他让她去了。一个店铺的外面摆着芒果。珍妮买了一些。她随即吃了一个，感觉很舒服。

珍妮回去把余下的芒果给了艾伦和孩子们。一些母亲就给珍妮钱请她再去买一些回来。珍妮又去买了五十个。一会儿工夫，孩子们就给芒果盖了起来。当士兵们送第二桶茶的时候，俘虏们送给他们每人一个芒果。吃过水果和茶，大多数的女人和孩子能吃下一些饭，感觉也就强了许多。

第二天早上，她们觉得身上又硬又疼，有些孩子还让老鼠给咬伤了。对她们来说，已经根本难以再走。可是，曹长还是强迫她们上路了。

那天，她们走到了一个叫阿撒罕的地方，十英里的路，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一个名叫考拉德的老太太每十分钟就要停一停。她本来就是个笨重的女人，又被痢疾和疟疾折磨得十分虚弱。她只能艰难地慢走。其他女人帮她带东西，搀扶着她。士兵们则帮着她们带孩子。

下午的时候，考拉德太太的脸色变青又转红。当她们到达阿撒罕的时候，又发现那样的一个空橡胶库。两个女人扶着考拉德太太进了房。她靠着墙坐下。一个女人打来水帮她洗了洗脸。考拉德太太请求大家帮助照顾她的两个男孩子：本和哈里。后来，考拉德太太就倒下不省人事了。几个小时后，她死了。

考拉德太太死后，何塞福尔太太和珍妮去找曹长。让他明白她们的意思实在太困难了。她们一面说一面打着手势。

“明天我们不能走了。”她们说。“我们必须停下来休息一下。今天已经死了一个女人。明天我们要休息一下，后天再走。”

“明天，埋那女人。”曹长答应了。“后天开路地。”

一大早，她们就去埋葬考拉德太太。村长指给了她们可以挖坟坑的地方。她们把考拉德太太的遗体轻轻放进了坟坑。何塞福尔太太从她的祷告书里念了几句话。珍妮后来又请木匠给做了个小十字架插在坟头。她们也就只能做这些事了。

大约中午光景，小野队长乘着一辆大轿车经过。当他看到坐在橡胶库房外面的俘虏时，立时勃然大怒。

“为什么不走路？”他向她们发火。“饭地不给了。快快地开路！现在！”

“昨天，考拉德太太死了。”何塞福尔太太告诉他。“我们今天埋葬了她。今天我们不能走了。明天再走。”

“有女人死了？什么原因？疟疾？”小野队长问。

“她得了痢疾和疟疾。”何塞福尔太太答道。“她已经非常虚了，又走了这么远的路，不但疲劳，连呼吸都困难。她昨晚死了。还有两个女人累得站不起来了。要不你进去看看她们？”

小野队长走进房里看了看那两个女人。她们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墙。小野队长开始用和善的口气同何塞福尔太太讲话了。

“我地，去吉隆坡。”他说。“去弄卡车地。这女人的死，大大地可伶！”

女人们转忧为喜，她们猜想明天就可以到达吉隆坡了。可是，小野队长晚上归来时带来了坏消息。

“吉隆坡地不能去。火车桥统统地毁了，被英国人统统地炸毁了。现在，你们去斯维特哈姆港，坐船到新加坡地。”他告诉她们。

“那卡车呢？”何塞福尔太太问。

“抱歉，卡车地没有。”他回答说。“还是要走路地。你们，慢慢地、慢慢地走。两三天后，船会有地。”

“可那是不可能的，队长。”何塞福尔太太说。“太远了，怎么走？我们至少要有个车让孩们坐。

“卡车地没有。”他回答说。“你们，走路地。”

小野队长没再说什么，上了汽车开走了。她们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

（六）克朗之行

第二天早上，她们继续上路。现在，只有两个士兵帮她们带孩子了。小野队长带走了另外两个士兵，因为他相信没有人能逃跑。

艾伦的路走得太费劲了，搞的珍妮既要抱娃娃又要背毯子。珍妮光着脚牵着小简妮走。艾伦背着背袋，兼照料着佛罗第。

那天晚上，她们在一个叫巴克里的村子附近的一座平房里停留。那里有一个浴室和一堆烧火用的木材。每个人都洗了热水澡，女人们还洗了衣服。这对她们来说，是个了不得的享受了。她们幻想着：不久就要有船坐了。

第二天，她们在一些橡胶园的林荫下走路。路很难找。珍妮用马来语向橡胶工人问路，然后她把路指给曹长。

下午，一个男孩子在路上踩到了一只蝎子。他本·考拉德，已故考拉德太太的小儿子。他的脚被螫伤，疼痛难忍，肿得无法走路。何塞福尔太太背着他走了一小时，曹长背完了其余的路。

当晚，她们来到一个叫迪利特的村里。曹长去找村长要食物和住处。村长不愿她们住在村里，因为没有空房子，日本人拿粮食又不给钱。折腾了很长时间，村长给了一些大米和鱼，并让她们住在一个小茅屋里。曹长向村长许诺，费用以后会支付。

一进茅屋，女人们就开始照料本。她们切开他的伤处，磨了些药粉放进去，然后用热绷带包好。在她们做这些事的时候，珍妮去找村长谈话。

“真是对不起，给您添了这么多麻烦。”她说。

“没什么麻烦的。”他回答说。“看到你们疲病交加，我们很不安。你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吗？”

“今天是从巴克里。”珍妮回答说。

村长把她请到屋里。他们喝了一杯咖啡。珍妮把她们的故事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

“那个曹长说你们明天要留在这里。”村长说。

“我们太虚弱了，不能每天都走路。”珍妮说。“所以士兵们允许我们走一天休息一天。要是明天我们能在这儿休息，对我们的帮助就太大了。曹长说他们会付你粮食钱的。”

“日本人是不会给钱的。”这位老人说。“不过，你们可以留在这里。”

“除了道谢之外，我们再也做不了什么了。”珍妮说。

村长笑了。他说：“《可兰经》第四章里头说，如果你同情女人并帮助她们，上帝会高兴的。”

她们在迪利特待了一整天，准备去斯维特哈姆港口外面四英里的克朗。小本·考拉德现在已非常虚弱，他的脚还是又肿又疼，并且不能吃不能睡，吃什么吐什么。村长让村里人给做了一副担架，女人们把他放上担架抬着上路了。

一到克朗，曹长先把她们安排在一所学校的空房子里，就去找负责军官弄食物。一会儿，他领着一个叫乃木少佐的军官回来了。这名军官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你们是什么人？”他问她们，“要干什么？”

“我们是俘虏。”何塞福尔太太答道。“我们是从皮纳被小野队长送出来的。他说有船带我们去新加坡的俘虏营。”

“这里没有船。”乃木少佐说。“你们应该呆在皮纳。”

“我们是被押送来的。”何塞福尔太太说。她决定转移话题跟他说点儿别的。“这里有医生吗？一个孩子正伤得要命。一个女人已死在路上了。”

“她怎么死的？”乃木少佐赶紧问。“病死的？”

“不，不是的。是走路给走死的。这个男孩儿是让蝎子给螫伤的。”何塞福尔太太回答说。

“我会派个医生来。”乃木少佐说。“今夜你们住下吧。可是你们不能住得太久。我已经没有足够的食物给我自己的人吃了，哪里受得了你们又来三十个人呢？”

他回营房去了。当天晚些时候，一个医生来探望她们。他嘱咐女人们继续用热绷带包扎本的脚，然后就走了。但是，本的状况却是更坏了。几天后，她们派人再次请来了那位医生，请求他把本送到医院去。六天后，她们听到了孩子的死讯。

（七）走向东海岸

她们在克朗住了十一天，得到的食物数量很少、质量又差。她们已经花光了身边几乎所有的钱，所以也没办法额外买东西吃。

第十二天，乃木少佐来查点。他用他们这里的一个军曹代替了那位曹长。少佐命令她们去迪克逊港，那里也许有船可让她们去新加坡。他实在不愿意她们在克朗再住下去了。

这是一九四二年三月中旬。直到月底，她们才到达迪克逊港。因为何塞福尔太太发了高烧，她们不得不在一个村子里停留好几天。她体温四十度三天不降。刚退烧恢复一点儿，她便挣扎着随队上路了。她慢慢地恢复了一些，但无法复原了。这样，珍妮就变成了这个队伍的首领。

到达迪克逊港的时候，她们的衣服又破又脏。珍妮卖掉一个饰针得了十三元钱。她用其中的两元买了一块布做了件简单的马来式衣服。她又用布头和旧衣服改成一件小衬衫。这样一来，她看起来顺眼多了。后来，有些别的女人也学着她做了一下。在达迪克逊港，她们没有找到船。但这个地方住起来倒还舒适。她们可以在海水中游泳。海水帮她们解除皮肤上的病痛。可是，十天之后，日本指挥官再次把她们推入奔波之中。他让她们到塞伦班去乘火车。

在去塞伦班的路上，小简妮·浩兰死了。她得了疟疾而她们也就只能给她洗洗头还得拉她赶路。两天之后，她死了。她们把她埋葬在一个穆斯林公墓中。艾伦·浩兰在这伤心的一天里表现得很安静，但珍妮听到她哭了大半个夜晚。

小娃娃罗宾倒还不错，皮肤晒成了棕色，也没有象别的孩子那样闹痢疾。绝大多数时间，是珍妮照顾他。走路的时候是珍妮背着他。而珍妮自己在克朗时也曾发过高烧，但很快就恢复了，并且比以前更强壮了。

塞伦班没有火车。她们被告之要南行到淡边。到了淡边，又要她们到马六甲乘船。马六甲没有船，她们又回到淡边。淡边食物缺乏，女人们情愿步行去新加坡也不想在那里忍饥挨饿。

下一个城市是金马士。路上，何塞福尔太太死了。她自从两个月前发高烧后一直没有彻底恢复，体温时常上升，身体越来越弱。在阿依库宁，她染上恶痢，两天之后就去世了。富里斯太太说，她以后可以帮大家办事。富里斯太太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在这些人里面年纪最大。在长途跋涉中，她病得非常讨厌以致于人人都希望她快死了算了。现在，她突然变得活跃和乐于助人了，尤其是帮助珍妮为大家做事情。她在马来亚住了十五年，到过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地方。

一到金马士，她们给安排到学校的一所空房子里。照例，军曹去找本地指挥官和筹备食物。他回来的时候跟来了一位军官。珍妮就告诉他她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们想去新加坡，去那里的俘虏营。”她最后说。

“新加坡，容不得，许多俘虏。”泥次郎队长说。

“那我们到哪儿去呢？”珍妮伤心地问道。“我们不能再走路了。有七个人死了。我们该有个落脚地了。”

“对不起，新加坡，不能去。”泥次郎队长坚决地说。“新加坡，俘虏，太多。”
“我们可以留在这儿吗？”珍妮问。

“不行，不行！”泥次郎队长嚷着说。

“那我们到哪儿去？”珍妮又问。

“明天，明天告诉。”他边答边走了。

珍妮把这位队长的话告诉了女人们。她们并不怎么惊讶。

“如果他们要丢下我们的话，我们就找个村子住下来，一直到战争结束。”富里斯太太说。

“那倒是好事。”珍妮同意。“可是，村子不给我们吃的，日本鬼子却给。”
“就他们给的那点吃的！”富里斯太太说。“在淡边就差点儿没饿死我们。”
第二天，这位日本军官来给大家训话。

“今天，你们，去关丹。那里，关丹，有新女俘营。”他对女人们说。

“关丹？那是个什么地方？”一个女人问。

“在东海岸，离这儿有一百五十英里。”富里斯太太说。

“能乘车去吗？”珍妮问。

“对不起，卡车，没有。”泥次郎队长说。“你们，走路。每天，几英里。旅行，愉快。到了关丹，关丹，非常幸福。现在上路。”

“我们现在不能走。”珍妮坚决地说。“我们一点儿准备都没有，而且连早饭都没吃呢！”

“好，今晚，来一顿，好吃的。明天上路。”泥次郎队长说完就走了。

女人们议论着她们该怎么办。

“我不信关丹有俘虏营。”一个女人说。

“我也是。”另一个说。“到处都不要我们。我们消耗食物，添麻烦。所以，每个军官都往别处送我们。”

“我看挺好的。关丹可是个好地方。”富里斯太太说。“她在美丽的东海岸，地方乾净，人民善良。”

一大早，她们和一个曹长还有一个新的士兵出发了。她们沿着铁路走。由于没有火车，也就没有危险。可是，由于没有树荫，感觉上天气更热。

她们走了一个星期，隔一天休息一天。孩子中出现了发高烧现象，两次中个个都轮到了。有七个孩子是在一个叫巴户的地方染上这种病的。她们在那个地方停留了一个星期。尽管女人们用了最大的努力来照料这些孩子，但其中四个还是死了。有一个就是佛罗第·浩兰。

佛罗第死后，珍妮很担心艾伦。她试图让她多亲近一下小娃娃罗宾。可是，艾伦太虚弱了，连抱他走路都不行。走路时，还是要珍妮带罗宾，陪他玩儿。艾伦只负责喂他。

日本兵帮了她们很大的忙。每个士兵通常带一个孩子并握一个担架柄。他们无法与女人们交谈，全靠打手势。珍妮在各村庄替他们问路。
在阿依可楞，艾伦·浩兰的力气、终于用尽了。那天，她跌倒了两次，是在其他女人的帮助下走着路。尽管她已经很瘦了，但用担架抬未免太重了。她还是在当晚走到了阿依可楞。可是，她的脸色在变化，先是变成深红，然后转变为青色。

她们找了一个房子让她进去休息。女人们帮她洗了脸又给她一点儿汤。可她什么也吃不下。这时，她已经知道自己不久人世了。夜里，她和珍妮小声地谈着。

“亲爱的，真抱歉，我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她说。“我对不起比尔。你要是能再见到他，让他不要难过，劝他和别人结婚。他还很年轻呢！”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话了。“我真高兴，这娃娃喜欢你。”她说。

早上，她还活着，但已不省人事了。中午左右，她死去了。当夜，她们在村子的公墓埋葬了她。

阿依可楞是个非常不卫生的地方，到处都是蚊子和沼泽。白天很热，而晚上则有冷雾从沼泽弥漫而来。

差不多人人都开始受另一种热病的折磨了。她们的体温不算太高，但头疼得厉害，还恶心。珍妮也病了。她打算在这个地方停下休息一天。但是，曹长和富里斯太太坚持要离开沼泽，赶到较高的村子去。珍妮同意他们的意见。她们又上路了。

小娃娃罗宾这次也发了烧，这是他第一次得病。珍妮带他到一个村的村长家。村长的老婆拿出一瓶树皮酒。珍妮尝了尝，然后给罗宾吃了一些。当晚他就好了。别的人没有这个运气。又有三个女人和一个孩子死在了这段路上。

后来，她们到了较高的地面，决定休息一天。她们住在一个村民善良的村子里。人们给她们找好睡觉的地方，又送来许多水果和蔬菜。珍妮她们的感觉都非常好。这次休息对以后的走路有极大的帮助。

四天后，她们走到了吉隆坡至关丹的公路上。路旁有个叫马兰的小镇。镇子里有五十座左右民房，一所学校和几家店铺。在公路边，她们看到有两辆卡车停在那里，两个白人在修理其中的一辆，还有几个日本士兵站在一旁。这是她们五个月来第一次看到白人。

（八）澳大利亚卡车司机

这一小群妇孺就走到卡车旁边看着这两个人工作。卡车上满载着从铁路边运来的木板。一个日本士兵站在车上，手里握着枪。还有一个也带着枪站在路上。士兵们没有对女人们说什么，于是她们就站在那里看。一个白人用英语说话了。

“让这些女人走开吧，”他嚷道。“我看不干活儿了。”

女人们笑了起来。听到有人讲英语，她们感到亲切和高兴。

“好吧！请不要生气。”珍妮说。“我们就是看看。”

“谁在说话？”这个男子问道。“谁在用英语说话？”

“是我。”珍妮说。“我们都是英国人。”

两个男子盯着她们看。女人们的大半和马来女人的打扮一样。珍妮把她的长发梳成一个辫子搭在背上，没有穿鞋。孩子们的穿着破烂不堪。她们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颜色特别深。

“你们看起来不是英国人。”高个儿的男子说。

“也许我们不象是，”珍妮说。“但是我们是。”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他问。“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们是俘虏。”珍妮回答说。她指着跟她们一起来的士兵，“我们在步行去关丹的俘虏营。”

“关丹没有什么俘虏营。”这个男子说。“只有几个像我们这样的俘虏。我们都是开卡车的。我们住在茅屋里，并没见有什么俘虏营。”

“我并不惊讶。”珍妮说。“日本鬼子一直对我们说谎。没有人想收留我们，所以就到处送我们。”

“你们从哪里来的？”这个男子问。

“我们是在皮纳被俘的，那是五个月前。”富里斯太太说。“我们到过克朗、迪克逊港、塞伦班、淡边、马六甲、金马士，现在到了这里。”

“我们已经走了大约五百英里了。”珍妮说。

“五百英里！就你们这些人走了这么远的路？”这个男子问道。

“是的。”珍妮回答说。“就我们这些人。还有十五个死在路上了。”

“什么？”这个男子大吃一惊。“你们死了十五个人？嘿！本，你听到没有，都发生了什么事啊！”

这个人的朋友正同别的女人谈话。“这些女人已经告诉我了。”他回答说。“我简直不能相信。”

“你们呢？”珍妮问道。“你们是什么人，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们是澳大利亚人。”这个男子说。“我叫乔·何曼，他是本·莱格特。我们是在大约两个月前被俘的，一直在开卡车。这差事儿比在俘虏营强多了。今晚你们住在哪里？”

“就这里。”珍妮答道。“我们得去找村长问一下我们可以住在什么地方。”

“明天走吗？”他问。

“我们通常走一天休一天。”她回答说。“我们不能让孩子们每天都走路。所以，明天留在这儿。可是，说不定我们能坐上你们的卡车呢。车出了什么毛病？”

“闸烧了。”乔回答说。“可是现在已经修好了。不过，我们可以轻易地弄坏别的什么东西，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住上一晚。我们怎么搞一下这车？本？”

“把后轴弄坏。那就一塌糊涂没法走了。我现在就动手。”本回答说。

“好！一会儿我帮忙。”乔说。

他走近珍妮。“我能帮你们什么吗？”他问她。“你们有药品吗？”

“没有。我们很需要。”珍妮说。“我们需要一些治胃肠病、疟疾和皮肤病的药。许多孩子正病得很利害。”

“你们有钱吗？”乔问。

“没有。我们的钱都花光了。”珍妮回答说。“可我们还有些散碎珠宝，可以拿来换钱。”

“我不希望使用这些。”乔说。“我看看我能找到什么。快去找住处吧。过一会儿我去看你们。”

珍妮就走过去叫上曹长，和他一起去村长那里要食物和歇息处。她们被允许使用学校的房子。随后，她们就照例进行洗漱和清扫。

同时，两个澳大利亚人在进行他们的工作。一小时之后，他们弄坏了后轴，油向下滴着。他们把这个指给一个看押士兵看，告诉他们今晚走不成了。看押士兵有所怀疑，但是无可奈何。他只好走开去给他们弄饭。

现在，只有一个看押士兵了。乔托词去解手。他沿着一排房子的后面飞快地向一所店铺跑过去。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个自己拥有一台小车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能讲一点儿英语。

“你要汽油吗？”乔问。“你给个价儿。”

经过几分钟的交涉，澳大利亚人在一片纸上写下：医药、痢疾、疟疾、皮肤病。然后，小车主给他三个空油罐。乔带着它们悄悄地回到卡车旁。看押士兵看见了，但他以为他确实是去解手了。

天黑了，乔用卡车油箱中的油把油罐装满。他带着它们去找那个中国人。中国人给了他一些药并说明了都是些什么。然后，乔去了学校那里，站在打开着的门外。

“今天下午和我谈话的那位女士在吗？”他小声探问。

珍妮已经睡着了。她们叫了她。她走出房门。

“你好，乔。”她说。

“你好。”乔说。“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珍妮·佩吉。”

“珍妮·佩吉。”乔重复着。“我记住了。这是药，珍妮。这是治疟疾的奎宁。这是止痢的中药。你们把药粉放到热水里每四小时吃一次。这是护肤霜。”

“太好了！”她说。“这得多少钱？”

“没花钱。”乔说。“我用日本鬼子的汽油换的。”

“可别让他们发现呀！”珍妮说。“如果拖到明早才去关丹，他们会生气不？”

“不会。”乔说。“这些卡车常出毛病。我们晚了，他们不会感到意外的。”

“你们把那些木板弄哪里去呀？”珍妮问。

“我不知道。”乔答道。“我想，日本鬼子正在什么地方修另一条铁路。可我不知道在那里。”

珍妮在门口的台阶坐下。乔坐在她下面的地上。

“在澳大利亚你也是个卡车司机吗？”珍妮问。

“不，我是个牧民。我在沃里拉附近的一个牧场养牛。沃里拉离泉口大约有一百英里。”

“什么泉口？”珍妮问。

“艾丽斯泉口。你不知道什么是艾丽斯泉口？”乔说。他对她的这个不知道深感惊讶。“它们在澳大利亚的正中间。在阿得雷德至达尔文差不多一半路的地方。”

“我以为澳大利亚中部都是沙漠呢！”珍妮说。

“不。”乔说。“那里有很多水。草地围绕着人住的房子。四季常青。北部地区的大部份乾燥一些，但是河里有水。即使有时候河干了，你也能挖掘河床找到水。”

“你们养了多少牛？”珍妮问。

“我离开的时候大约有一万八千头。”乔说。“有时多些，有时少些。”

“一万八千头！多大的牧场啊？”珍妮问。

“大约有两千七百平方英里。”乔说。

“那么大！”珍妮惊讶不已。“你们有多少人在那工作呀？”

“一个管事，四个牧民，九个工人。”乔告诉她。“一共十四个人。”

他们坐在那里沉默了一阵子。澳大利亚人想起了他的家乡。珍妮也对那一万八千头牛、十四个人的大牧场产生了浓厚兴趣。英国的情况很不同，城里挤满了人，农场都很小。

珍妮和乔聊了一个小时。最后，乔站起来要走。

“我不能在这里呆太久。”他说。

“非常感谢你送我们这些药。”珍妮说。她也站了起来。“它们一定会对我们大有帮助。”

“我争取尽量给你们多弄些东西。”乔说。“你们还需要什么？”

“我们最需要肥皂了。”珍妮回答说。“我们一直一点儿肥皂都没有，洗什么都洗不乾净。”

“如果可能的话，我弄点儿肥皂。”乔说。“真抱歉，刚才谈了那么多我的家乡，你一定听烦了。”

“不，不烦。”珍妮说。“我爱听你谈。”

“晚安，珍妮！”乔说。

“晚安，乔！”珍妮说。

珍妮看着乔走到了卡车那里。然后，她走进了学校的房子。

（九）肥皂和猪肉

第二天早上，珍妮把药拿出来让女人们看。

“乔是个好样儿的小伙子，对吧？”富里斯太太说。“我听到你俩昨晚聊了很长时间。”
“他想家了。”珍妮说。“他喜欢谈他的国家。你知道，他是个牧民，是养牛的，他以前工作的牧场有六十英里长呢！”

“好极了，他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富里斯太太说。“要是他喜欢说，你就听他说。我们也真的没有别的方法感谢他了。不知他能不能用卡车拉我们去关丹。”

妇孺们等了一阵子，不见有卡车来接她们。澳大利亚人请求看押士兵带妇孺们一块儿走，但日本兵不同意。

“卡车太满。”他们说。“女人孩子会压坏卡车。俘虏必须走路。”

修后轴费了乔和本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在他们准备上路之前，乔冲着本说话了。

“跟看押士兵说一会儿话，让他看不到我在干什么。”他说。“我想弄松一个螺母让油漏出来。昨天我从油箱里弄了六加仑的油。我们跑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没油而抛锚。我们把漏油处指给他们看，说明为什么丢了油。”

他弄松了螺母，汽油从油管慢慢地滴出来。然后，他们出发了。

妇孺们在马兰休息了一整天。到关丹还要走五十英里。但是，路还算不错，没有沼泽。第二天，她们走了很远的路，到勃安过夜。

在勃安她们休息一天。她们留神着卡车，但一直未见到。晚上，一个马来女孩子给了她们一个包裹，里面有六块肥皂和一封乔的信。

亲爱的珍妮，

这是一些肥皂。以后我再多弄些。我没法子见到你，因为日本鬼子不让我们停。卡车没油了，所以我们晚了一天。马兰那位中国人汽车主说他会把包裹送给你们。路上请注意我们。

乔·何曼

下一天，妇孺们走到了伯卡普。她们穿过一些椰子种植园。一个女人卖了一双鞋买来了足够多的青椰子，请大家喝椰汁。在伯卡普，她们被安排在一个装干椰子壳的长棚子里。在那里，她们使用多日未见过的肥皂进行了例行的洗浴。

接近黄昏的时候，两辆卡车开来了。乔和本从车上跳下来。珍妮她们走过去同他们聊天。看押她们的士兵也去和跟卡车的士兵谈话。

“谢谢你的肥皂。”珍妮说。“昨晚就派上用场了。”

“这么说你们收到那个包裹了。”乔说。“好极了！这次我们搞到一只猪。”

“一只猪？”珍妮问。

“是的，一只猪跑上了公路。”乔说。“我用卡车追，日本鬼子用步枪打。他打了六枪没打中，第七枪打中了。我呢，赶上去把它压死了。我们不得不把多数的肉让给鬼子，可是也有足够的给你们。”

这天晚上，她们得到一大块猪肉吃。她们把它和米一块儿放到汤里。

稍晚，乔来找珍妮。她正在和小娃娃一块儿玩耍。

“抱歉，没能多弄点儿肉。”他说。“多数让鬼子霸去了。”

“这就相当不错了，乔。”珍妮说。“这是我们的第一顿好吃的，留下的还够吃三顿呢！”

“你们需要更多的好吃的。”乔说。“你们太虚弱了。”

“可能我们太虚弱了，但比以前强多了。”珍妮说。“那些药帮了我们的大忙。今天我们还吃了水果、椰子汁和猪肉。用肥皂洗浴后，我们也清爽多了。”

“这对你们倒成了陌生的东西。”乔说。“鬼子来之前，你们都是做什么的？”

“我们绝大多数都结婚了。我们的丈夫在这里工作。”珍妮说。

“现在他们在新加坡的俘虏营吧？”乔问道。

“是的，我想是这样。”珍妮说。

“你们也一定想到那里去了？”乔问道。

“是啊，那一定比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来得容易。”珍妮说。

“日本鬼子不知道怎么处理你们才好。”乔说。“你们不能留在一个地方直到战争结束吗？”

“是的，我们也这样想过。”珍妮说。“可是，我们需要食物，哪里去弄啊？”

“说的是，你们做不到。”乔说。几分钟后，他眨眨眼睛说，“我知道个能给你们搞几只鸡的地方。”

“可是，我们还没付肥皂钱呢！”珍妮说。

“日本鬼子已经替我们付了。”乔说。“我偷了他们一个人的一双靴子，卖了靴子买的肥皂。”

“你真幸运没被捉住。”珍妮说。

“骗这些日本鬼子很容易。”乔说。

“你还想偷鸡吗？”珍妮问。“要当心啊！”

“没关系。”乔说。“如果你们收到鸡，吃就是了，别问从哪里来的。”

“好的，乔。我们不问。”珍妮说。

她挨着罗宾坐在地上。乔坐在她身旁。

“现在跟我说说澳大利亚吧。”她对乔说。“那里很热吧？”

“是的。是很热。”乔回答说。“有时候可达到摄氏四十七度。可那是一种燥热。你会象在这儿一样不出汗，但却感到口渴。”

“你的家乡景致如何？”珍妮问。她知道他喜欢谈他的家乡，而且她也有兴趣多了解一点儿澳大利亚。

“一切都是红的。”乔告诉她。“土地和岩石是红的。日落时，一切又都变成了紫色。真是美极了！在雨季，雨水把大地染绿两个月。然后，一切又都变成红色。你的原籍是什么地方？”

“骚桑普敦。”珍妮回答说。

“就是那个所有的船都从那里出来的地方吧？”他问道。

“对，对。”珍妮说。“她不算太美。可是我在那里过得很好。我常常梦到回去再见到她的那一天。”

他们谈了几分钟，乔起身要走。

“明天我们见不到你们。”他说。“我们清晨就走。但明天以后我们还能来。”

珍妮牵着罗宾和乔一起走到卡车那里。

“我们明天在这里休息。后天去坡哈依。”珍妮告诉他。

“我要为你们弄来那些鸡。”他说。

“可真要当心啊！”珍妮郑重地说。

“没什么危险。”乔答道。“如果有危险的话，我就忘掉这些鸡，再寻点儿别的什么。我不想找麻烦。我想维持两年的安全，到战争结束好回家。”

“战争还有两年？”珍妮问。

“是本说的。”乔回答。“不过，要振作。你们就快得到一些鸡吃了。”

“可真要当心啊！”珍妮重复说。

“一定！再见吧，珍妮。”

“再见，乔。”珍妮说。

（十）五只黑鸡

第二天早上，她们听到卡车开走的声音，但是没有见到澳大利亚人。妇孺们当天休息，下一天走向坡哈依。大约中午的时候，那两辆卡车从她们身旁开过。卡车当时是空着的，是向铁路那个方向返回。车过身旁，乔和本向女人们招手，女人们也向他们招手。

没有什么鸡从卡车上丢下来。珍妮反倒高兴了。她知道弄到鸡肯定不容易。她担心他们被捉到。没有弄到鸡则说明他们平安无事。

当天晚上，当她们在坡哈依学校校舍的时候，一个马来男孩子来见她们。男孩子带来一个绿色的帆布袋子，说是甘榜的一个中国人派他来的。珍妮打开帆布袋子，看见五只大个儿的黑鸡，都是活的，脚捆着。

珍妮必须要编个谎话跟日本看押士兵讲，因为她无法把这些鸡瞒过他们。她决定去问问富里斯太太的意见。

“我们怎么跟日本鬼子说呢？富里斯太太。”她问道。“我们要杀鸡，把鸡弄熟，他们一定看得见。我们不能说是澳大利亚人给我们的。这东西肯定是乔和本偷的，弄不好他们会有麻烦。”

“我们可以说是村里的老百姓给的。”富里斯太太说。

“不，不能那么说。”珍妮说。“这里的人不那么友善。日本鬼子是不会相信的。他们一定会去问村长，而村长不会帮我们。”

“我们可不可以说是买的呢？”富里斯太太问。

“可以。可是日本鬼子会问钱是从哪里来的。”珍妮说。

“我们可以说卖了个饰针。”富里斯太太说。

“我觉得他们不会相信。”珍妮说。“因为在我们买东西之前，他们和我们一直在一起。”

“那我们就应当说，是澳大利亚人给我们的钱。”富里斯太太说。

“这倒可以。”珍妮担忧地说。“可我不想给他们找麻烦。”

“他们不会卷进来的。”富里斯太太说。“没人知道鸡是他们给的。”

“好吧。”珍妮说。“我们就说我们是用澳大利亚人给的钱买的鸡。可是，我们说是在哪儿买的呢？”

“那个马来男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富里斯太太问。

“他是从甘榜来的。”珍妮回答说。“我们还没有到那里呢，所以不能说是在那里买的。我们要说澳大利亚人在伯卡普给了我们钱。我们想在那里买鸡，可是当时没有。有人说他可以弄到给我们送来，我们就留下了钱。”

“我希望他们能相信我们编的瞎话。”富里斯太太说。“我们还必须给日本鬼子一只鸡。这样，他们就不会问太多的问题了。要是出了事儿，也许还会帮我们呢。”

“我不想给他们鸡。”珍妮执拗地说。“澳大利亚人弄的鸡是给我们的，可不是给日本鬼子的。”

“是的，亲爱的。”富里斯太太说。“我同意。可是，我觉得我们必须给他们一只鸡。也许，他们会要两只呢！”

珍妮知道富里斯太太是对的。她就找曹长去了。

“看，”她说。“今晚我们能吃上一顿好饭了。我们买来了鸡。”

她打开布袋让他看鸡。然后，她伸手进去拿出来一只。

“这是给你们的。”她说着，把鸡递给了他。

曹长非常惊讶。

“你们买的？”他问。

“是的。”珍妮说。“今晚的好吃的。”

“你们哪儿来的钱？”他问。

“澳大利亚人给我们的钱。他们看我们太虚弱了。”珍妮说。“现在，我们有了好吃的东西，送一只给你们。”

“两只吧！”曹长说。

“不。”珍妮坚决地说。“一个。这是礼物，因为你们态度和善，帮助孩子，并且允许我们慢慢地走。只有五只鸡，而我们有十七个人。”

她打开布袋让他数。这时，她才注意到，所有的鸡都是大个儿的，黑色的，不像她们在村子里平常见到的鸡。

“一个给你们。四个给我们。”她说。

曹长点点头向她笑了。他高兴地提着一只鸡走了。当晚，看押士兵和俘虏都都饱食了一顿像样的鸡肉米饭。

同一天，关丹最大的日本军官大发雷霆。他是三木队长。他住在从前英国地方长官住的房子里。在花园里，有二十只那位英国地方长官一九三九年从英国带来的母来

亨鸡。现在，三木队长养着它们。他对这些鸡很是在意。这天一早，他发现丢了五只。给鸡装谷物的绿色帆布袋子也不见了。

三木队长叫来宪兵，命令他们找到鸡和偷鸡的人。

他们立刻怀疑到了澳大利亚卡车司机，于是来到了他们的茅屋。他们发现了一些罐头和香烟，没有鸡和绿色帆布袋子。

三木队长命令宪兵全城搜查。第二天，他们搜查了关丹的每一所房子，寻找黑鸡毛和绿色帆布袋子。他们什么也没找到。

三木队长越发恼怒了。他命令宪兵检查他自己的士兵的住处，但是仍然没有发现什么。有的士兵没在关丹，出去看守两个澳大利亚卡车司机了。又过了一天，三木队长派了四个宪兵出去盘查这些士兵和澳大利亚卡车司机。在坡哈依和贝哈特之间的公路上，宪兵们遇到了一小群妇女和孩子在路上走，两个日本士兵跟着她们。其中的一个，一个肩膀上扛着步枪，另一个肩膀上背着一个绿色帆布袋子。宪兵们停下了他们的吉普车，询问曹长这个袋子的来路。

曹长指了指珍妮。宪兵开始询问她。她把她编的瞎话给他们讲了一遍。澳大利亚人给的钱。她们在伯卡普买的鸡。鸡是用这个绿袋子装的。

宪兵不相信。他们反复地盘问她。不时地打她的嘴巴，踢她的腿，踩她的脚。珍妮就是不改口。她知道这个瞎话并不圆满。可是她想不出该说些什么。

两个小时以后，三辆卡车出现在公路上。第二辆的司机是乔·何曼。曹长立刻拦住了他的车，带他去见宪兵。

“这就是给你钱的那个人吗？”宪兵问。

“我跟他们说了你给我们四元钱的事，乔。”珍妮说。“我们用这钱买了些鸡。可是，他们不相信。”

“你没有给她钱。”宪兵说。“你用这个袋子给了她鸡。你在关丹司令部偷了这个袋子和这些鸡。”

乔看到珍妮流着血的脸和脚。他立刻明白，只有说实话才能保护她。

“放开她，你们这些笨蛋！”他用沉缓愤怒的声音说。“是的，是我偷了鸡把鸡给她的。”

宪兵立刻命令妇孺们上卡车。他们带着她们和乔直接去见三木队长。

三木队长决定处死乔。宪兵用钉子把乔的手和脚钉在树上。然后，他们开始殴打他直到他咽气。三木队长让妇孺们站在旁边观看。

（十一）没人看押的俘虏

当日本人确信这位澳大利亚人已经死亡之后，三木队长冲着妇孺们讲话了。

“你们，统统地都是坏人。”他说。“这里没有地方给你们。你们滚，滚到哥达巴鲁。现在就滚。”

时值中午，天气酷热。她们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就沿着公路北上了。她们要尽快离开关丹。三木队长也处罚了那个日军曹长。他留下了那士兵，曹长一人更为孤单了。

当时是七月间。她们离开了关丹，在公路上慢慢地走。她们在一个渔村度过了第一夜。她们都睡得不安稳，孩子们更是时常惊醒。她们是梦见了乔·何曼的死，醒来之后仍然出于恐惧之中。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她们一天也没有休息。她们要尽快离开三木队长。

东海岸的环境是美丽宜人的。由于有海风吹拂，天气也较为凉爽。她们每天都能吃到鲜鱼。不久，她们身体强壮了一些，不那么容易得病了。她们每天都到海水中泡一泡，海水对她们的皮肤很有好处。

她们也发现她们有空搞点儿娱乐了。自从在皮纳被捕以来，孩子们第一次开始能玩耍。一位母亲开始利用空余时间教学。珍妮开始训练小罗宾走路。

唯一难受的是那位日军曹长。现在，连个谈话的人都没有。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看起来有些惨然。有那么一两次，珍妮试图跟他聊聊，可他并不作答。

她们沿着海岸行走，每天走完路就在渔村休息。路上只有不多几个日军哨卡。每到一处，她们跟军官说明后继续上路。经常是一个礼拜都见不到一个士兵。

有时候，队伍中有人病了。她们就停住下来直到这个人好了为止。没有再死过什么人。她们感觉到，坏日子已经过去了。

将近八月底的时候，她们到了瓜拉太朗。这是个沿河的村镇，离哥达巴鲁有大约七十英里。村民们以在河边种水稻和在海里捕鱼为生。

这时，曹长病了，发高烧。女人们感觉对他有些歉意。他总是帮忙带孩子，而每个孩子死时他都流泪。现在，他发了高烧，女人们就帮他拿背包、步枪和靴子。当她们进村时，要一个女人用受牵着他来走路。他病得是如此厉害，以致于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珍妮只身去找村长。他是个五十来岁的人，名字叫马特·阿明·宾·太伯。她把她们的身份告诉了他。

“我们是俘虏。”她说。“我们正在被从关丹押解去哥达巴鲁。我们需要吃的和住处。这个日本兵是押送我们的人。他害了高烧，所以我们需要个凉快点儿的房子给他住。请让我们住下并给些吃的吧！”

“我这里没有欧洲女人爱住的地方。”马特·阿明慢慢地说。

“我们不要什么欧洲女人的住法。”珍妮说。“我们是俘虏，和你们的女人一样住就行。我们不需要特别的房子和床。我们只要睡觉的地板，一点儿鱼或蔬菜，再加上一些大米。”

“你们可以和我们吃一样的东西。”马特·阿明说。“可欧洲女人就这个住法倒是奇怪了。”

马特·阿明把曹长带进了自己的房子。他给了他一些退烧药吃，拿了个垫子让他躺下。珍妮和富里斯太太离开了曹长去照顾孩子和做晚饭。

当早上她们再到村长家时，曹长的情况更糟糕了。他眼看就要死了。女人们帮不上什么忙。珍妮拿来他的包裹，一个本子从他的衬衣里滑落了出来。本子中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一个女人和四个孩子。她把照片指给他看。她希望这能给他战胜高烧的信心。但是，他做手势让她拿走照片。等珍妮再回身看时，只见他泪流满面。

曹长越来越虚弱。两天之后，他死了。她们把他埋葬在一个穆斯林墓地。她们多数人都哭了，因为他已经变成一位好朋友了。

现在，她们是没人看押的俘虏了。她们开始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看咱们是不是就留在这村里。”富里斯太太说。“这个地方很富有，附近又没有日本鬼子。我愿意在这儿悄悄地住到战争结束。”

“是的，我也愿意。”珍妮说。“可是，日本鬼子一定会发现我们。这样，村长会会因为留我们在这里而遭殃倒霉。日本鬼子会杀死他的。”

“不过，他们可能发现不了我们。”一位母亲说。

“也许。”珍妮说。“可是，如果我们留下，就等于是让马特·阿明身处险境。”

“是的，你对。”富里斯太太说。

“并且，还有一件事。”珍妮说。“村民还得要供我们吃的东西才行。”

“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种粮食呢？”富里斯太太说。“有一半的稻田闲着呢。”

“是吗？”珍妮说。“这是为什么？”

“男人都叫日本鬼子抓走了。”一个女人说。“他们可能是在乔说的那个铁路那里干活。”

“也许我们干不了稻田里的活吧？”珍妮说。

“我可干不了。”一个女人说。“我这么老，不能在泥水里种水稻。”

“我看这是个好主意。”另一个女人说。“要是能在一个地方呆下去的话，我愿意种水稻。”

“我同意。”富里斯太太说。“日本鬼也许会同意这样呢。象以前，我们从这村走到那村，没人愿意给我们东西吃。如果我们留在这里，我们能自己干活，自己种粮食吃。”

又讨论了一会儿，她们都同意由珍妮出面请求马特·阿明，让她们在这里住下来。

（十二）瓜拉太朗

早上，珍妮去找马特·阿明村长。她在他家门外遇到了他，礼貌地向他问好。接着就同他聊天儿。

“马特·阿明，今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地里没有稻子呢？”珍妮询问道。

“没有人手种稻子。”马特·阿明告诉她。“这里还有渔民，可是他们没有时间干田里的活。所有别的男人都在给日本鬼子干活呢。”

“是在修铁路吗？”珍妮问。

“不是，”他说，“他们在公克达克修飞机跑道。”

“要不久他们就能回来种水稻吗？”珍妮问。

“我看不会。”马特·阿明回答说。“完成了公克达克的跑道，他们就要去修马强的一个，再就是康马特的一个。日本人会很长时间不放这些人。”

“那么谁来种水稻呢？”珍妮问。

“女人们尽可能地种一些。”马特·阿明说。“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稻米给我们自己吃，但是没有多余的给日本人。”

“马特·阿明，”珍妮说，“我想和你谈点儿重要的事情。要是我们中有个男人，我会请他来跟你谈。可是我们都是女人，所以跟你谈话请不要见怪。”

马特·阿明笑了，带她走上他家的台阶。穿过过廊，他们面对面坐在地板上。他叫他的老婆给他们弄咖啡。在等待的功夫，珍妮谈了些别的事情，因为这是惯例。

一会儿功夫，咖啡被用两个粗制的杯子端了上来。咖啡里没有牛奶和糖。珍妮端起杯子喝了一点儿。然后，她放下杯子正式和他谈话。

“马特·阿明，我们正处于困境。”她说。“我们的看押士兵死了。我们必须决定怎么办。你知道，我们都出了些什么事。我们在皮纳被捕。从那之后，我们已经走了几百英里的路了。城镇里的日本军官不要我们，所以就往别处送我们。我们从这里走到那里已经有六个月了。人已经死了一半了。”

“这我知道。”马特·阿明说。

“我们的看押士兵死了。我们怎么办？”珍妮说。“我们可以去找一个日本军官，可他也一定不想收容我们。如果我们是男人，也许他们很快就会枪毙了我们。可是我们是女人和孩子。他们就知道把我们送走了事。有一天我们会走到一个潮湿的地面死于高烧。”

“不要怕。”马特·阿明说。“这是上帝降灾考验你们呢。《可兰经》上是这样说的。”

珍妮突然想起了迪利特的村长跟她说的话。

“《可兰经》上还说过，如果你善意对待女人和孩子，上帝会高兴的。”珍妮对马特·阿明说。

“在哪个地方这么说了？”村长问。

“在第四章里。”珍妮回答。

“你是穆斯林？”他惊讶地问。

“不，我不是。我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基督徒。”珍妮说“可是，我们住过一个村子，那里的村长对我们很好。我感谢他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给我听。我自己并不懂《可兰经》。”

“你是个极聪明的女人。”他说。“告诉我，你想要得到什么。”

“我们想留下来，在村里参加劳动。”珍妮说。

马特·阿明看起来相当惊讶，但他什么也没说。

“先让我们住下两个礼拜。”珍妮接着说。“在这两个礼拜中，让你们的女人教我们怎样种水稻。我们整天劳动来偿还你给我们的食物和住处。”

“可是，如果我让你们住下来，日本人会生气的。”马特·阿明说。

“我知道。”珍妮说。“所以，两个礼拜后，我就去找一个日本军官。我告诉他我在种水稻。你也跟我一块儿去同他谈。你告诉他，如果我们留在这里，日本人会多得一些大米。”

“可是，欧洲女人是不能在田里工作的。”马特·阿明过了一会儿说。

“欧洲女人还不能想我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走路走死呢。”珍妮回答说。

马特·阿明沉默起来。

“你必须决定，马特·阿明。”珍妮说。“你能送走我们，也能帮助我们。如果你送走我们，我们就会死去。如果你帮助我们，英国人回来时是会感谢你的。他们一定会回来，因为有许多国家在和日本人作战。”

“我希望他们不久能回来。”马特·阿明说。

他们沉默着坐了一会儿，慢慢地喝着咖啡。几分钟后，马特·阿明跟珍妮说话了。

“我不能这样快地决定下来。”他说。“我的所有人都应该知道你的计划。我要和我的兄弟们讨论它。”

珍妮告辞离开了。当晚，她看见有许多人去了马特·阿明的家。她知道，他们在谈她的计划。

当夜稍晚，马特·阿明来找珍妮。珍妮出来见他。她在一盏小油灯的灯光下在那里同他谈话。

“我跟我的兄弟们谈了你的计划。”他告诉她。“有些人有点儿顾虑。他们觉得如果你们在田里干活儿的话，英国人回来时会不满。英国人也许会说是我们强迫你们干的。”

“我可以立下字据。”珍妮说。“我就说是我们自愿干的。英国人回来时你把字据拿给他们看。”

“我不需要你写字据。”马特·阿明说。“他们来时你直接说嘛。”

第二天，女人们下田劳动了。村里的两个姑娘教她们怎样种水稻。田里满是泥水，但女人们没有觉得工作怎么难。第二个礼拜结束时，她们已经学会了种水稻。

在第十六天，珍妮和马特·阿明离开村子去找日本人。他们带着曹长的步枪、军服和笔记本。

最近的日本驻军在瓜拉莱斯特，有二十七英里远。路上，珍妮和马特·阿明在一个村长家歇了歇脚。当他们到了瓜拉勿兰时，马特·阿明带着珍妮来到马来管理机构的高级头目那里。这个人的名字叫东郭·本答拉·拉加。

东郭·本答拉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当珍妮把她们的长途跋涉说给他听后，他对她们报以了深切的同情。

“不过，”他说，“欧洲女人恐怕不能在田里劳动吧？”

“是我们自己要种水稻的。”珍妮说。“我们实在不想到处走了。如果日本人在什么地方有个俘虏营，我们就到那里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愿意呆在瓜拉太朗。”
“他们没有俘虏营。”东郭·本答拉说。“也许他们会让你们留在瓜拉太朗。今晚你们就住在我家里，明天我带你们去和日本民政长官谈谈。”

当天晚上，珍妮七个月来第一次睡到了床。她感觉特别热，睡得不舒服。

第二天早上，她随着东郭·本答拉和马特·阿明去见日本民政长官。这个日本人在美国念过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愿意帮你们。”他对珍妮说。“我带你们去见毛利十八陆军大佐。他是这里军队的大头目。他将会决定如何处置你们。”

毛利十八陆军大佐在听完珍妮的故事后表情不悦。他没有女俘营。他没有人手看管她们。

“我不能管这些俘虏。”他说。

“那么，她们该怎么办？”东郭·本答拉问。

“别处有俘虏营吗？”民政长官问。

“没有，当然没有。”毛利十八陆军大佐说。

“那为什么不让她们留在她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民政长官问。

“因为我不想管理她们。”毛利十八陆军大佐说。“如果她们留下，你必须来管理她们。”

“好，”民政长官说，“我来管理她们。”

他们离开办公室后，民政长官和东郭·本答拉谈了话。他告诉他，这些妇孺可以在她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住下来。珍妮和马特·阿明回瓜拉太朗去了。

她们在那里生活了三年。

（十三）战争之后

战争在一九四五年结束了。英国人回到了马来亚。瓜拉太朗的这些妇孺被接送到哥达巴鲁，然后由一架飞机运到新加坡。在那里，她们见到了当初在皮纳被带走的那些男人。

珍妮告诉了比尔·浩兰有关艾伦和两个孩子的事。他悲哀地听着。不过，他还有个罗宾，一个结结实实的四岁小男孩儿。比尔看到罗宾和珍妮特别亲近，就请珍妮留下来和他们一起呆了一段时间。

在新加坡期间，珍妮寻找着自己的家人。她哥哥唐纳死在缅甸。当初，他被日本人捉到送去修铁路，在那里有许多俘虏送了命。

她给在英国的妈妈拍了个电报。十天之后，她收到了住在威尔士的姨妈的回电。回电说，她妈妈早在三年前就去世了。现在，珍妮已是孤儿一个了。

在他们回到英国之后，比尔·浩兰向珍妮求婚。但是，她拒绝了，只身去威尔士和姨妈住在一起。

后来，珍妮来到了伦敦。她在一家名叫“帕克和利维”的制造皮鞋和手提包的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是给经理帕克先生当秘书。她开始象任何其他英国姑娘一样，过起了安静的生活。

珍妮时常记起在马来亚的战争岁月。她思念在长途奔波中死去的女人和孩子。她当然更不会忘记乔·何曼之死。尽管她只有二十七岁，可她觉得自己有点儿老了。她没有考虑将来。珍妮打算过一个安静的生活。她不想结婚生子。

两年，珍妮一直在伦敦过着安静的生活。一天，她收到了一个律师给她的信。一个住在苏格兰的伯父去世了，留给她一笔钱。珍妮记得曾在苏格兰见过一个什么人，可是她已经忘记了他。这封信要她去见这个律师。

律师向珍妮读了遗嘱，向她说明，她的伯父给她留下五万三千英镑。

“这意味着你不需要工作了，佩吉小姐。”律师告诉她。“这些钱每年的利息就有大约一千英镑。你可以有一所小房子，一台小汽车和一个仆人。”

“我突然之间发财了。”珍妮说。

“是的，现在你是一个阔女人了。”律师说。“你应当决定用这些钱来做什么。”

“是的，我要做决定。”珍妮说。“可我不能决定得太匆忙。目前，我还要在‘帕克和利维’继续上班。”

珍妮工作了两个月后，又去见那律师。

“我已经决定用部分钱来做什么了。”她告诉他说。“我想去马来亚造一眼井。”

律师非常惊讶。珍妮跟他说明了战争年代里发生的事情。

“你看，”讲完了她的故事后，她说。“我们在瓜拉太朗呆了三年。那是幸运的三年。人们对我们善良友好。我们没能偿还这个情谊。可是，现在我有钱了。我能给他们一些回赠了。”

“可是，为什么要给他们一口井呢？”律师问。

“村里的女人没有井。”她解释说。“她们必须要走两英里才能见到水，然后带着水走两英里回来。一口井能对女人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这么说你要到那村子去一次了。”律师问。“那之后你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珍妮回答说。“不过，我现在就离开‘帕克和利维’。等回来后，我再找点儿别的事情干。”

律师和马来亚的银行商定了当她需要时可以支款的事宜。他又写信给哥答巴鲁的地方长官，告诉他珍妮要去的消息。

一九四八年六月，珍妮再次去了马来亚。她只带了一个很小的行李。她从此再也没有回英国来。

（十四）井

地方长官在哥达巴鲁机场迎接了珍妮，并把她带到自己家里去住。她在哥达巴鲁呆了两天。珍妮惊奇地发现，她在这里名气满大的。住在马来亚的人都知道她在战争期间的作为。

第三天清早，一个司机用吉普车把她送到了瓜拉太朗。她只带一个小手提包。她穿着马来服装，就像她在这里生活时一样。

地方长官已经给马特·阿明送了信，所以当她到达时，村民们正在等着她。对能再次见到她，每个人都非常兴奋。她见到了战后归来的男人们。当天夜里，她又睡到地板上了。她睡得不舒服，但感觉比在伦敦幸福。

第二天上午，她开始和女人们讨论起她的计划。

“我刚回英国的时候，”她告诉她们，“我没有什么钱，所以必须工作。我在一间办公室里打字。一天，我从伯父那里得到一大笔钱。现在，我算是个财主了，不必一定工作。”

她停了一下。女人们互相之间谈论着她们所听到的。

“我回来了。”珍妮继续说。“因为我想给大家一点儿回敬。在我们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对我们太好了。我想给一点儿对你们女人有好处的回敬。我想造一口井。这样你们取水就容易了。我还想造一个洗衣房，你们可以在那里洗衣服。这样你们就不用到何边去了。”

这时，女人们已是异常兴奋了。她等着，直到她们重新安静下来。

“我希望你们决定下来在那儿造井，在那儿建洗衣房。”她说。“你们还要告诉我洗衣房的内部该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如果男人们同意的话，我再去问问他们。”

女人们把这个计划兴高彩烈地讨论了两个小时。起初，她们怕男人不同意。珍妮告诉她们，她要去找马特·阿明。后来，她们中有几个人挨着珍妮坐下。她们在沙土上画起井和洗衣房的草图来。

傍晚，珍妮去找马特·阿明。他们在过廊坐在一起喝咖啡。

“我要给这村子一点点回敬。” 珍妮说。

“听说你要造一口井和一个洗衣房。” 马特·阿明说。

“是的，对极了。”珍妮说。“我知道取水到村里要走多远。每天取水对女人们来说太辛苦了。我想帮帮他们的忙。”

“可是，这河流对她们的女祖先不也是足够好了吗？”马特·阿明说。“如果女人们有了这井，她们会变得懒惰起来。”

“可是，这样她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力量来干别的工作帮助男人。”珍妮回答说。

“是的，我理解。”马特·阿明笑了起来。“你过去在这里的时候已经把这些话跟我说过多次了。我要和男人们谈井和洗衣房的事儿。全村人一定要仔细讨论你的计划。”

第二天，男人们就开会了。早上，他们派人把珍妮请来。珍妮把她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她画了一个井和洗衣房的图，指给他们看，以及女人们打算把它们建在何处。当每一件事男人们都搞清楚了之后，她就听任决定了。

男人们没有很快决定下来，因为这个思想太新奇了，它必将改变这个村庄的正常生活秩序。不过，两天之后，他们告诉珍妮他们同意。

那一带只有一个家族会打井，他们住在关丹。珍妮给他们写信请他们来。然后，她订购了水泥和砖。在等待打井工人的一段时间，她陪孩子们玩耍，帮助女人们侍弄水稻。

三个礼拜后，打井工人赶到了。水泥和砖已先期到达。他们立刻投入工作。打井工人是一位老人和他的两个儿子。他们跟珍妮讨论了井的形状和打法后，就熟练地动工了。

珍妮花了许多时间观看这些人干活。过了几天，她向他们提起了那件她永远不会忘记的悲惨事情。

“你记得关丹的那个日本军官吗？”她问老人。“他叫三木队长。”

“记得。”老人回答说。“他是个非常坏的家伙。他走了我们都高兴。后一个军官就稍好一些。”

“三木队长战后受了惩罚。”她说。“他被处决了，因为在缅甸铁路那里过份虐待俘虏。”

“我不知道这事儿。”老人说。“不过我听了很高兴。他做了许多残忍的事情。”

“你记得他做过的事吗？”珍妮问。

“记得。许多人受了严刑处罚。”老人说。

“我看到一个俘虏受处罚。”珍妮说。“在我们被饥饿和疾病折磨时，他帮助了我们。日本人捉住了他。他们把他吊在树上，用钉子钉穿了手和脚，把他给活活打死了。”

“我记得这事儿。他曾在关丹的医院住过。”

“在医院？”珍妮惊问。“什么时候在医院？”

“可能不是一个人。”老人说。

他喊了声他儿子。他们正在井下干活。

“你们记得战争头一年有个英国兵给吊在树上打的事吗？他死了吗？”他问。

“他不是英国人。”一个儿子说。“他是澳大利亚人。他是因为偷了鸡挨打的。”

“是的，”老人说，“是那么回事。那是些黑鸡。他死了吗？”

“三木队长让他的人晚上把这士兵放下来。”这个儿子回答。“他们把钉子从他的手脚上拔了出来。他活着。”

（十五）澳大利亚

六年了，珍妮的心里第一次有幸福的感觉涌动。她曾努力不去想乔·何曼的惨死，但她从来也不能忘却。她喜欢乔并且总是觉得是自己害死了乔。自从那悲惨的事发生后，珍妮的心从没有摆脱过哀伤。当听说他没有死的消息，她当然是无比兴奋。

现在，她知道她该干什么了。她打算到澳大利亚去看看乔的情况怎样。她记得他是住在一个叫艾丽斯泉口的地方附近。珍妮现在是个有钱人了。如果他有什么困难，她是有能力帮助他的。

可是，井和洗衣房要首先完工。工人们迅速地工作。不久，一切事情都停当了。村里所有的人都来参加开用仪式。珍妮拉出第一桶水并把水提到洗衣房。当珍妮开始洗衣服时，每个人都鼓掌欢呼起来。珍妮知道，村民们对她的回报是高兴的。

两天之后，她告别了村里的朋友们。

“谢谢你，珍妮。”他们都说。“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

“我也不会忘记你们。”她说。

当赶到哥达巴鲁时，她极度疲劳直接去睡觉了。第二天，她把所做的事情告诉了地方长官。

“每个村子现在都需要一个洗衣房。”他说。“你给他们树立了榜样。不过，你怎么办？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去？”

珍妮跟他讲了乔·何曼的事情和她要去澳大利亚的计划。

“我先去关丹。”他说。“我到医院那里去找一找他的消息。”

两天之后，珍妮飞去关丹。路上，驾驶员把她请进他的小间。他们正从瓜拉太朗上空飞过。珍妮能看见女人、孩子跑出茅屋看飞机。后来，驾驶员把飞机开走了。珍妮回到了她自己的座位上。

她在关丹很幸运。她找到了一个战争时期在医院当护士的女人。

“啊，对啦。我记得他。”她告诉珍妮。“乔·何曼，那是他的名字。当他们把他弄到医院时，他伤得真是可怕。我们决没有想到他会好起来。可他却真的好了。我们护理他四个月。”

“我是他曾经帮助过的女人中的一个。”珍妮说。

“你是那伙女人的头头吧？”这女人问珍妮。“他经常打听你的下落，可谁也不知道你们到哪里去了。”

“后来他怎么样了。”珍妮问。

“他刚能走动就给送到新加坡去了。”这女人回答说。“他能扶着棍子走路。我真希望他现在全好了。但是，他一定不可能拿重物了。”

珍妮飞去了新加坡。她花了几天时间计划她的行程。她协商好了向艾丽斯泉口拨款的事宜。

她首先飞到达尔文。达尔文有通到地处澳大利亚正中心的艾丽斯泉口的公共汽车。达尔文是个沉闷的地方。没有什么事情好做。没有什么地方好去。两天后，公共汽车出发了。她旅行在满是灰尘的公路上。车近艾丽斯泉口，她记起了乔告诉她的有关他家乡的往事。地面是红色的。等到太阳一落又都变成了紫色。最后，她到达了艾丽斯泉口。

她在特尔伯特·阿姆斯旅馆下了汽车，登记了一个房间。茶罢，她去街上散步。她穿行在有花园和凉台的平房之间。她又走上了主要街道去逛商店。这里有两家电影院，一家理发铺，一家时装店和一家牛奶庄。她懂得了乔为什么说这里是个好地方了。她开始感到自己会喜欢住在这里。

晚饭后，她开始了她的找乔工作。她不想让每个人都知道她是怎么认识乔的。她告诉旅馆的女主人她是找亲戚的。

“我打算在阿得雷德跟我妹妹住在一起。”她说。“我叔叔要我如果到了艾丽斯泉口的话就试着找一找乔。我叔叔最后一次得到他的音信时，他是在这附近的一个牧场工作。”

“他叫什么？”女店主问。

“乔·何曼。”珍妮回答。

“乔·何曼！莫不是在沃里拉工作的那个？”女店主问。

“正是。”珍妮说。“你知道他是不是还在那里？”

“不，他不在那里了。”女店主说。“战后他是回来了。不过，他只呆了六个月。他受过日本人的严刑拷打。他们把他吊在树上打。”

“多可怕呀！”珍妮说。“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不知道。不过，那儿有个人可能知道。”她说。

她向在餐间喝啤酒的人们喊了一声。

“你们谁知道现在在哪里？”她问道。

“我知道。”其中有个人回答。“他到昆士兰州去了。在海湾附近的一个牧场当管事。离威尔士顿不远。我想，那个大牧场的名字可能是米达斯特。”

“那威尔士顿在哪里呢？”珍妮问。

“在海湾附近。”女店主告诉她说。“在这里说那里是在东北方向，大约有两千英里吧。”

“我怎么到那里去呢？”珍妮问。

“你可以坐飞机从这里飞到克龙卡雷。”女店主说。“每个礼拜有两个航班。然后你可以从那里飞威尔士顿。”

珍妮谢过了她。第二天，她买了去克龙卡雷的机票。她给乔拍了个电报说她就要去了。她还给她的律师写了一封信，让他向威尔士顿的银行转些钱。

珍妮必须等两天的飞机。在这些日子里，她了解到不少有关艾丽斯和国家的事情。她喜欢艾丽斯，真还有些舍不得离开。

克龙卡雷比艾丽斯小许多。在她飞往威尔士顿前，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

最后，她到了威尔士顿。在那里，她大失所望。乔不在那里。他没有在米达斯特牧场。他到英国去了，而且两个月之内回不来。

（十六）乔·何曼

现在，珍妮必须决定她该怎么办。等着乔吗？她为什么要见到他呢？她一直想知道的是他是否完全康复，他想知道他是不是需要帮助。现在，她已经知道他能胜任工作了。那么，她想见到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有别的原因。她还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像她喜欢乔那样喜欢的男子。在她相信乔已经不在人世时候，她就打消了结婚的念头。现在，她知道乔还活着并没有结婚。毫无疑问，她想做乔的妻子。

珍妮决定一直等到乔从英国回来。她计划在威尔士顿住几天，然后她去海边的一个大城市凯恩斯去。

她在威尔士顿逗留期间，了解了许多有关这个镇子和这里的人民的情况。只有一百四十人住在威尔士顿。只有一个商店和一个只卖给男人啤酒的小酒馆。对于女人的生活来说，这里是个沉闷的地方。姑娘们没有工作。只要姑娘们长到了足够大的年龄，就会离开这里，而通常她们的家庭也跟着迁走。珍妮知道她在这种地方没法儿生活得幸福。如果她和乔结婚，她一定要迁到别处去住。

也许乔不会乐意迁动。作为米达斯特的管事，他的工作是相当不错的。要是让他回到艾丽斯或者去阿得雷德，一定找不到这样的好工作。所以，到了别处他会不那么幸福。

珍妮苦恼起来了。她开始觉得她犯了个错误。她多半想回英国去了。可是，发生了两件使她留下来的事情。

第一件，她收到一封她的律师的信。他告诉她，乔到英国去是为了找她。乔找到了她住在威尔士的姨妈。姨妈给了他珍妮的律师的地址。现在，乔正在返回澳大利亚的途中。他将于六个礼拜之后到达离凯恩斯不远的一个城市汤斯维尔。

这封信很让珍妮高兴。乔大跑其路去英国就是为了找她。这多半是有要和她结婚的念头。但是，她还是对威尔士顿没有好感。她不想住在这种地方。她想生活在一个象艾丽斯那样的城市里。

但是，另一件事情发生了。一个人来到了旅馆，拿着一捆鳄鱼皮。忽然，她产生了一个想法。她也许能用她的钱在威尔士顿搞个车间，用鳄鱼皮制造皮鞋，然后拿到英国去卖。她将需要一些姑娘来当制鞋工。这样，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就有了工作机会。她们多半会留在威尔士顿结婚。

可是，姑娘们必须有地方花她们赚的钱。她也许能开个小店，卖冰镇牛奶、软性饮料、时新蔬果。威尔士顿会成为一个非常适于居住的地方。

珍妮开始在威尔士顿制定建车间和小店的计划。两个星期后，她去了凯恩斯并写了三封信。

第一封信是写给乔的。她告诉他，她在凯恩斯，要和他见见面。她把信寄给了汤斯维尔的轮船公司。当他上岸后定能见到这封信。

第二封信是写给她的律师的。她要五千英镑来建立车间和小店。

第三封信是写给帕克先生的。她把她的计划告诉了他，并寄送一张鳄鱼皮样品。她请他在英国为她代办卖鞋。

三个礼拜后，她收到了乔的电报。他将在第二天从机场到达。她心情激动地和他相遇了。她立刻认出了他。他没有多少变化，只是走路有些吃力。

“乔！”她笑着。

乔认出了她，也欢笑起来。

“喂，珍妮呀！”他说。“我跑遍了半个世界找你呢！”

她乐了，说，“我都在这里好久了。嗳，咱们别在这儿谈了。你去取行李。我来租汽车。”

不久，他们就坐在旅馆廊下了。

“你怎么到英国去了，乔？”珍妮问他。

“我得了国家抽彩一等奖。”他说。“这是我为什么有路费。战后回来，我曾在汤斯维尔工作，遇到一个飞行员。他就是战后把你们从哥达巴鲁运走的人。他告诉我你还没有结婚。”

“我当然没有结婚了。”珍妮说。

“可是我不知道啊！”乔说。“你那时老是抱着个孩子。我以为那是你的孩子，就认为你已经结婚了。可是，你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跑到澳大利亚来了？”

珍妮把有关瓜拉太朗的事说给他听。她说了她如何返回那里送给村民一口井和一个洗衣房。

“打井的工人告诉我你没有死。”珍妮说。“所以我决定来看看你是不是很好。告诉我，为什么三木队长放了你？”

“我也不清楚。”乔说。“他晚上去看我。他问我死前想要什么。他告诉我，在日本临死的人会给满足最后一次愿望的。我要他给我一只鸡和一瓶啤酒。他离开一个小时左右和一些人回来了。他没有弄到啤酒。因为他没有弄到啤酒，他就没有让我死。他让士兵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乔，那悲惨的日子真是难过呀！”珍妮温和地说。“我太幸福了，你又好了。”

“别谈太多那些事了。”乔说。“现在你怎么打算？你要在这里呆多久？”

“我要长期在这里住下去了。”珍妮慢慢地说。“我要把威尔士顿变成像艾丽斯一样。”

六个月后，他们结婚了。

珍妮致力建车间。律师给她发来五千英镑。帕克先生同意代她卖鞋。四个月后，珍妮把第一箱鞋运往伦敦。

小店不久也建了起来。珍妮还修了一个游泳池，开了一个理发店。

珍妮的愿望实现了。威尔士顿慢慢地变成了艾丽斯一样的城镇。三年之后，这里的人口增加到四百多。人们在谈论从凯恩斯修一条公路，并要开一家医院。

乔在大牧场努力工作。牛只每年增长。不久，他已有了足够的钱从主人那里把牧场买了下来。

珍妮和她的丈夫和孩子们一起，在这个她越来越热爱的国度里，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

二零零二年八月于纽约

全文完。威尔士顿变成了艾丽斯一样的城镇(A Town Like Alice)。

送交者: 老椰子 于 August 20, 2002 20:30:07